

# 越南的高台教：一個混育宗教的探析

許文堂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 一、引言

一個新興宗教的產生往往是因為該社會原有的宗教信仰已經不足以撫慰一些人的精神，因而藉著一種「更新」的教義解釋來吸引並滿足信徒。「更新」可能是某些基本教育的重新解釋，並非新創的教旨，也可能是一種新創的宗教以更符合該社會需求的教義來回人民的精神層面。

一九二〇年代在越南南部出現的高台教 (Dao Caodai) 無疑是一種非常特殊並加上民間信仰的產物，它混合了儒、釋、道、基督教義，並加上民間信仰，甚至有類似穆斯林的祈禱儀式，不僅包容了東西古今的聖哲增添了神秘的奧義教派色彩，使其在農村得以迅速的發展，成為越南境內的第三大宗教，這可能得力於其領導階層，樸實的教義，嚴密的組織，應許或應驗的乩言。高台教義混合了各派教義，它也融合了越、華、柬、法等各種族的信徒，容納了各種可能性的發展。

最特別的是高台教對獨立自主的追求，在法國殖民者統治下的合作與抵抗，第二次大戰期間和日軍的合作，戰後和越盟、南越各屬政府的關係，無不充滿神秘色彩，反而不若其教義的簡明。

問題是，如果不是因為戰爭，使高台教徒的民族主義立場在選擇合作對象時與共產黨徒不同，高台教在日後就能得以興盛的發展？

一個統合性的宗教，可能意味其信徒的世界觀的高度發展，宗教的社會性也相對的擴展到理性境界，何以這樣的一種宗教能在越南農村迅速的傳播，得到上百萬的信徒？它的信仰基層 (substratum) 為何是建築在農村？批評者或者認為其理論混沌幼稚，符合宗教哲學境界較低的民眾易於各取所需。

由於戰亂以致相關資料有限，且不易取得，世人對於這個原欲普度眾生的宗教也更難以深入了解，本文為對此一混育教義的宗教作初步探析。

## 二、大道三期普度的開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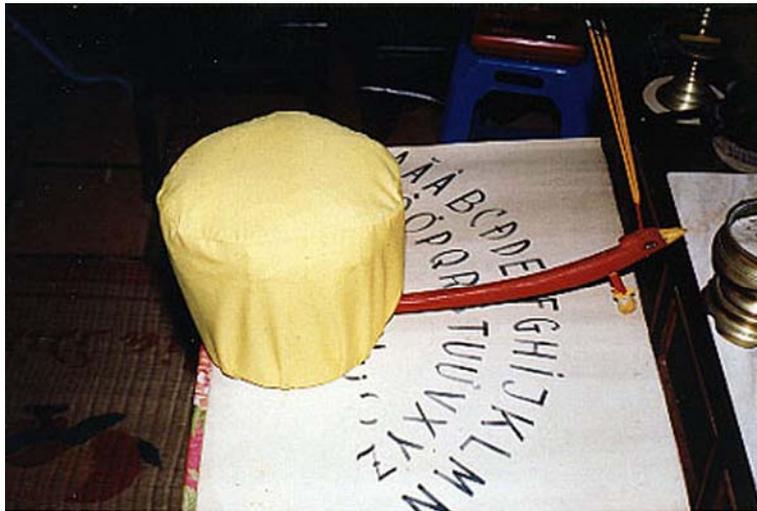
越南長期接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在宗教和民間信仰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即使西力東漸之後，對於由歐洲傳入的天主教的接受過程亦頗為雷同。因此，在越南民間社會的精神生活中，儒、釋、道、耶各教及民間信仰可說是主要的潮流，但是在 1920 年代，越南南部卻出現一個新興的宗教——高台教，它統合了儒、釋、道、基督四大教義，並接納民間信仰中的神祇作為其教義中的使徒，這種開放性的綜合教義 (syncretism) 使其得以迅速發展，並確立自身在越南社會及宗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高台教 (Dao Cao Dai) 是一般教外人士對該教的稱呼，所謂的「高台」是指至上之神的居所，至上之神或以名之，可稱作「高台仙翁」或「高台上帝」(Cao Dai Thuong De)，教內神職人員則稱之為「AÁÁ」，祂代表了上天或上帝或造物主對於人類的第三次普度，因此教名為「大道三道普度」(Dai Dao Tam Ky Pho Do)。所謂的第一次普度是指在兩千五百年以前，分別由佛教之燃燈古佛 (Nhiem

Dang Co Phat)，道教之太上老君 (Thai Thuong Dao Quan)，儒家之伏羲 (Phuc Hi)，及基督教之摩西 (Moses)，代表開啓。第二次普度是由釋迦牟尼佛 (Sakyamuni)、老子、孔子、耶穌分別創教，以救世人。現在乃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普度，由上帝決定統合所有宗教，消除世界的隔閡，建立一個天上地下皆為博愛公平的世界。由於祂超越了所有的宗教，故謂之為大道。

高台教的創立應歸諸幾位靈魂人物。首先是吳明釗 (Ngo Minh Chieu, 1878-1932) 又名吳文釗 (Ngo Van Chieu)，他是身受越、漢、法三重文化洗禮的知識份子，接受法國在西貢的殖民學校 Chasseloup-Laubat 訓練之後，進入殖民政府官僚體系。在 1920 年，他在派赴富國島 (Phu Quoc doi) 任知府職的期間，因為參加扶鸞 (Pho Luan) 而感受靈召，從此熱中此道。<sup>1</sup>在 1924 年他調回西貢時，即以此類聚會的靈驗而號召了不少人，其中許多是傳統知識份子或在殖民政府中任職。

根據吳明釗傳授的扶鸞降神方式，乩筆多次以「AAA」的身分出現，表達了建立新宗教以普度世人的期望，因此一群士紳頭面信徒正式向交趾支那殖民政府登記成立新宗教，並在報紙刊登廣告。但是吳明釗的姓名並未在此一公開信中。據稱，由於新任總督 Alexandre Varenne 力邀吳明釗進入總督府第二局服務，而第二局職司情報，因而致使一些高台教的上層神職懷疑吳為殖民政府蒐集教內情報，指其「背叛」，而逼迫吳交出權力。<sup>2</sup>



The Corbeille-à-bec and the Alphabet board

建教伊始即蒙上分裂的陰影，高台教的宗派主義也一直成為日後的發展阻礙。以吳明釗而言，他在 1928 年退出殖民政府，遷到芹且 (Can Tho) 另立支派。

黎文忠 (Le Van Trung, 1875-1934) 也是西貢 Chasse loup-Laubat 學校出身，殖民官吏的便利使其在經商獲利不少，但無度的揮霍損害了他的健康，幸而吳明釗的降神及乩筆使黎文忠幡然悔過，決意信奉高台，並成為擔任頭使 (Dau Su) 的重任，負責建立聖堂。

<sup>1</sup> Nguyen Huyen Anh. *Viet Nam Danh Nhan Tu Dien*, Saigon Nha Sach Khai Tri, 1970. p.254.

<sup>2</sup> Gilbert David. *Chroniques secretes d'indochine(1928-1946)*, Paris:L'Harmattan, 1994. p.27.

1926年11月黎文忠在距西貢西北九十公里的西寧省鵝堅縣(Gô Kèn)慈林寺(Tù-Lam Tu)將此一佛教寺院轉化成高台教的第一個殿堂。此時高台教已有信眾一萬多人。1927年3月,黎文忠並依神啓在龍城(Long Thamh)黑婆山(Nui Ba Den)附近購得百公頃林地,開始建築高台聖殿。<sup>3</sup>

這座號稱為高台教的梵蒂岡的聖殿(Holy See)建築可能是由來自西班牙迦太隆納的耶穌會士Pedro Martino協助設計,這名耶穌會士自巴塞隆納建築學校畢業,是西班牙建築大師高第(Antonio Gaudi)的門人,將西寧聖殿建築外觀設計有如主教教堂,內部則是雕龍巨柱的彩繪,極富特色。<sup>4</sup>



(西寧高台聖殿 Holy See)



<sup>3</sup> Gabriel Gobron. *Histoire et Philosophie du Caodaise*, Paris: Dervy, 1949. pp.33-35.

<sup>4</sup> Gilbert David.op.cit, pp.33-34.

(西寧高台聖殿內)

1929年，新任的交趾支那總督 Krautheimer 決意干預這股日漸龐大的宗教力量，以各種理由進行調查，最後將黎文忠投諸獄中，但僅一日即因各方聲援，而將黎釋出。這些不必要的阻擾宗教自由，使高台教內逐漸升起一股反法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日後爆發出來。

黎文忠在1930年擔任「權教宗」(Quyên Giao Tong)，暫攝教宗之職，直到1934年11月19日蛻化。<sup>5</sup>其後一年，西寧教派推出人稱「德護法」(Duc Ho Phap)的范公稷(Pham Cong Tac, 1890-1959)為繼任領導。

范公稷(Pham Cong Tac, 1890-1959)也是西貢 Chasseloup-Laubat 中學畢業生，曾經在西貢海關擔任低層文員。1925年間，范公稷及其詩社友人沈迷於扶鸞召神，終於得到高台上帝 AAA 的指示，與吳明釗等人成立高台教。<sup>6</sup>

1926年9月29日，范公稷等247人宣布成立高台教，10月7日並將一份法文宣言送交交趾支那殖民政府要求立案。<sup>7</sup>此後范公稷一直和黎文忠是西寧教廷成立的最重要力量，因此，在黎文忠蛻化之後，范公稷即以協天台護法一職，成為領導為數高達兩百萬高台信眾的最高權力者。

范公稷成功的發展了幾位法籍信徒，其中一位作家 Gabriel Gobron 被任命為「接引道人」(Tiep Dan Dao Nhan)，代表高台教出席了1936年的倫敦世界宗教大會(World Congress of Religions)，1934年巴塞隆那(Barcelona)及1937年格拉斯哥(Glasgow)的世界靈學大會(International Spiritualist Congress)，使得高台教的世界知名度大為提高。<sup>8</sup>

數目龐大的信徒和日漸高昇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使殖民當局採取格外嚴密的監控措施。尤其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新越革命黨」、「越南國民黨」以及「印度支那共產黨」相繼成立以來，證實加強防範的必要性。<sup>9</sup>此時，流亡日本的尊室彊柢(Cuong De)及其「復國黨」(Phuc Quôc)找上范公稷，尋求支持。另一方面，法國警方對於西寧聖堂的搜索行動，則更加強神職人員的民族情緒，使高台教傾向與復國黨合作，藉此得到日本的支持。<sup>10</sup>終於，護法范公稷對於信眾加入「復國黨」一事表示同意。事實上護國黨雖以長期流亡在日本的彊柢親王為首領，卻處處受日本「黑龍會」的節制，表面上以民族主義的號召，卻只能擁護「大東亞共榮圈」的日軍政策，利用日軍力量推翻法國殖民政府，希冀從而得到獨立自主，實無異於幻想。

1941年5-6月間，在三名日本外交人員訪問西寧聖堂不久之後，殖民當局逮捕范公稷為首的六名高層神職人員，將他們流放至非洲東岸的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方才釋回。

<sup>5</sup> Guyen Huyen Anh. *Viet Nam Danh Nhan Tu Dien*, 195-196.

<sup>6</sup> Tran My-Van, *Vietnam's Caodaism, Independence, and Peace: The Life and Work of Pham Cong Tac (1890-1959)*, Taipei: Academia Sinica, Prosea Research Paper no.38, Sept 2000, pp.3-6.

<sup>7</sup> Tran My-Van, op. cit. p.9.

<sup>8</sup> Gabriel Gobron. *Histoire et Philosophie du Caodaisme*, op.cit., p.199, p.206.

<sup>9</sup> 陳輝燦，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北京：三聯書店，1960)，卷一，頁245-246、261、263-268。

<sup>10</sup> Tran My-Van, op. cit. p.12-13.

1946年至1956年之間，范公稷不僅是高台教的最高領導，也積極介入政治，希望為越南尋求和平。但是越共的暗殺活動，以及吳廷琰政府的宗派戰爭使得范公稷選擇避居柬埔寨，但仍然掌控西寧高台教務，直到1959年5月蛻化。

### 三、高台教的組織

高台教具有相當複雜的組織機構，其神職人員階層森嚴，差堪比擬梵蒂岡天主教。

中央系統包括八卦台、九重台、協天台、以及職司社會服務的福天及職司宗教教育的普濟兩大機構。

八卦台（Bat Quai Dai）可說是高台諸神所在，並非一個實體機構，而是教宗與高台神靈佛仙聖溝通之所，通常要經由扶鸞降靈，以乩筆下達指示，成為高台教的最高立法機關。

協天台（Hiep Thien Dai）則可形容成司法機關，其最高職掌是接法（Tiep Phap）開法（Kai Phap）、顯法（Hien Phap）、保法（Bao Phap）。最高職位由護法（Ho Phap）一人，及上品（Thuong Phap）、上生（Thuong Sanh）各二人，以及十二時君的輔佐。護法的權力有如教宗，上品及上生則如同樞機主教，而十二時君則如紅衣主教。<sup>11</sup>

上品職掌接道（Tiep Dao）、開道（Khai Dao）、顯道（Hien Dao）、保道（Bao Dao）。

上生職掌接世（Tiep The）、開世（Khai The）、顯世（Hien The）、保世（Bao The）。

協天台的第二層品秩則可分為：<sup>12</sup>

接引道人（Tiep Dan Dao Nhan），同於正配使（Chanh Phoi Su）。

掌印（Chuong An），如同配使（Phoi Su）。

監道（Giam Dao），如同教使（Giao Su）。

改狀（Cai Trang），如同教使（Giao Su）。

承使（Thua Su），如同教友（Giao Huu）。

載士（Si Tai），如同禮生（Le Sanh）。

律使（Luat Su），如同智使（Tri Su）。

九重台主管宗教行政事務，教宗（Giao Tong）是最高權力象徵，代表上帝，是其子民的長子，領導信徒進入高台普度。<sup>13</sup>

教宗之下設掌法（Chuong Phap）3人，<sup>14</sup>

頭使（Dau Su）3人，

<sup>11</sup> Phap Chanh Truyen, *The Religious Constitution of Caodism*, Chapter: The Caodaist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1992, pp.179-198.

<sup>12</sup> Phap Chanh Truyen, *op.cit.* p.209.

<sup>13</sup> Phap Chanh Truyen, *op.cit.* p.31.

<sup>14</sup> Phap Chanh Truyen, *op.cit.* p.34.

正配使 (Chanh Phoi Su) 3 人，  
配使 (Phoi Su) 33 人，  
教使 (Giao Su) 72 人，  
教友 (Giao Huu) 3000 人，  
禮生 (Le Sanh) 人數不限。

正智使 (Chanh Tri Su) 3 人、副智使 (Phu Tri Su) 及通使 (Thong Su) 人數均無限制。最下層則為一般信徒。<sup>15</sup>

九重台之下設九院：吏 (Lai)、禮 (Le)、和 (Hoa)、戶 (Ho)、糧 (Luong)、學 (Hoc)、農 (Nong)、工 (Cong)、醫 (Y)，其職能約略與傳統政府部會的功能相同。

福天 (Phuoc Thien) 的創立較晚，於 1938 年設立。<sup>16</sup>其職司是社會服務，因而所賦予的品秩位階也較低，在中央是開道 (Khai Dao)，省級單位為芝天 (Chi Thien)，縣為教天 (Giao Thien)，村社為行天 (Hanh Thien)。主要工作是協助孤寡貧病的信徒在生老病死過程遭遇的困難。

普濟 (Pho Te) 職掌宗教教育及宣傳，成立於 1936 年。<sup>17</sup>在中央由協天台的配使 (Phoi Su) 負責。省級為教友 (Giao Huu)，縣級為禮生 (Le Sanh) 村社則由正智使 (Chanh Tri Su) 負責。

此外，高台教也設立域外宣教團 (Mission étrangère) 推展宣教，但除高棉之外，似乎未能較大的發展。因為法國殖民當局並未許可高台教在北圻、中圻的宣教活動，因此長期以來高台教的發展一直局限於南部地區。

#### 四、高台教的象徵與意義

高台教內使用許多的象徵符號，各自具有代表意義，分別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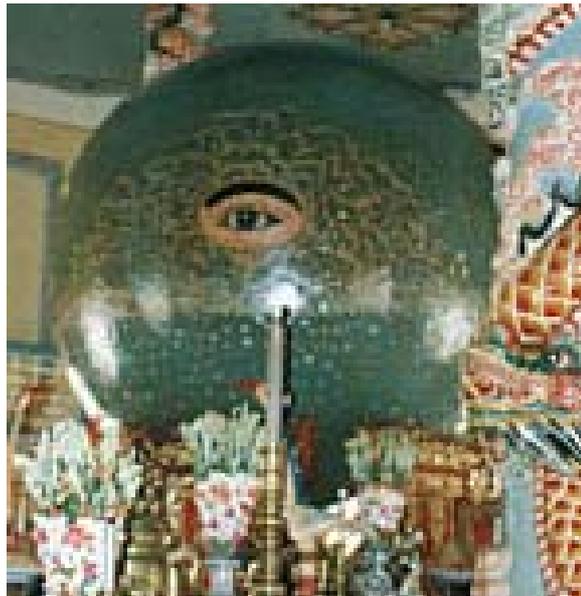
天眼：高台教以「天眼」象徵最高神祇，表達其超越性 (transcendence) 的神格實體 (entity)，也具有傳統東方的「上帝」、「天」的非人格觀；表達了無所不在的內在性 (immanence)，祂既是一元論 (monoism) 的表徵，又統合了泛神論信徒的概念，其他的佛神仙聖不過是其派遣的使徒，因而使得最高神祇的實在性 (reality) 不致產生衝突。天眼又表示神力遍照無所不在，無所不察，祂的供奉位置在祭壇的最上層。

---

<sup>15</sup> Phap Chanh Truyen, *op.cit.* p.99.

<sup>16</sup> Victor L. Oliver. *Caodai Spiritism, A Study of Religion in Vietnamese Society*, Leiden:E.J. Brill,1976. p.54.

<sup>17</sup> Ibid.



關於祭壇的配置，最上是天眼，其次是諸佛神仙聖，再次一層為燈，左右擺設瓶花、水果，次層則是水杯、酒杯、茶杯，最外層是香爐及左右燭台一對。



花及菓，代表宇宙萬物之原生力，是「精」的象徵。

酒，代表生命力的根源，是「氣」的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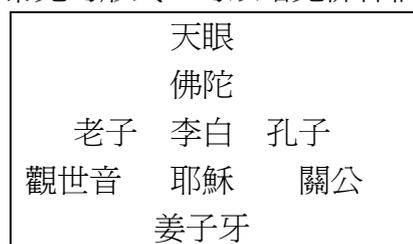
茶，是智慧的源泉，是「神」的象徵。

燭台一對，象徵陰陽兩儀之光。

香五柱，代表戒、定、慧、正見、解脫，也象徵信徒的五嚮：純潔、省察、睿智、頓悟、解脫；或是五種戒律：戒殺生、偷盜、淫邪、妄語、酒醉。

神位的配置方式也依信徒而有所差異，例如下列三式：

一、最為常見的形式，可以略見佛神仙聖在高台教中重要性的序列。





二、道教信仰和民間宗教的搏揉，各自佔有一席之地。

天眼			
瑤池金母			
玉皇上帝		鴻鈞老祖	
太上老君		文昌帝君	
地藏菩薩	文殊菩薩	觀音菩薩	普賢菩薩

三、也有簡化成單一牌位者，主要是女性信徒供奉。

請	諸	供
	真	
	靈	
	女	
位	派	座

儒釋道三教合一的象徵也經常春秋傳、寶瓶、法塵代表。



在信徒則以顏色區分。太 (Thai) 部信徒屬佛，以黃色象徵德行。上 (Thuong) 部信徒屬道，以藍色象徵寬容，玉 (Ngoc) 部信徒屬儒，以紅色象徵權威。



3 cây Tàn (?), / three ceremonial parasols (tàn)

(太、上、玉三色蓋傘)

高台信徒分爲上乘（出家）、下乘（在家）兩種，上乘包括所有神職人員，專事修行齋戒，推動教務。下乘教徒則依教義居家修行。

高台的教義可分爲內奧外易兩個層面，外易 (Exoterism) 指信徒每日奉行高台禮儀，在 6 時、12 時、18 時、24 時四次祈禱。遵守五戒，行善去惡，致力修身、齊家，對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萬物負責。

內奧 (Esoterism) 是指持齋修行，進入禪定 (Thien Dinh)，以達煉精化氣 (Luyen Tinh Hoa Khi)、煉氣還神 (Luyen Khi Hoa Than)、煉神還虛 (Luyen Than Huan Hu)、煉虛還無 (Luyen Hu Huan Vo)，終達涅槃，永生高台的境界。

西寧聖堂每日晨晚 6 時及 12 時四次祈禱禮拜，其科儀進行如下：<sup>18</sup>按部就班，信眾互拜，對天眼祭壇跪拜，誓願，祈禱，撚香，開經，歌誦，如願。莊嚴而豐富的儀式性，也是高台教強化信徒宗教情感聯繫的方式。

<sup>18</sup> Victor L. Oliver. *Caodai Spiritism, A Study of Religion in Vietnamese Society*, Leiden:E.J. Brill,1976. p.14.

## 五、高台武裝力量的建立

1941年，在范公稷等六名高級神職人員被捕，繼而流放到非洲之後，西寧高台教陷入領導無人的境況，法軍對高台教信徒的追捕，使得建立自衛武力的問題更為迫切。

高台教的武裝力量是由配使陳光榮（Tran Quang Vinh, 1897-1975）所建立，希望藉此力量自保，甚至推翻法國殖民當局，達到越南獨立的目標。<sup>19</sup>此時，日本在東南亞的軍事勝利，成爲一種極具說服力的選擇，尤其日軍當局對法屬印度支那的步步進逼，使這些高台教徒看清法軍力量的薄弱，企圖揭竿而起放手一搏。

1942年11月，陳光榮接洽進駐西貢的日軍當局，組織一批青壯高台教徒前往西貢的日軍船塢工作。這批爲數達一萬名的青壯年由日軍施以軍事訓練，其中三千餘人形成高台教的早期武力，日後並發展形成一支數量號稱高達五萬人的軍隊，並參與了日軍在1945年3月9日對法屬印度支那的突擊接管行動。高台教和日本軍的聯合行動似乎和長期流亡日本的阮朝宗室彊柢的促成有關，但是這次的「勝利」並沒能持續太久，五個月後日本即宣告無條件投降，高台軍隊的戰爭方要來臨。

戰後，英軍協助接收南越，並將之移轉給重新回到越南的法軍，將甫成立不久的「越盟」（Viet Minh）臨時政府視如無物，因此戰事立即開啓。而臨時組成的「越盟」內部各派勢力也未能合作，各爲己謀的結果是法軍的節節勝利。1945年10月15日，法軍攻進西寧，劫掠聖城，並殺害5名神職人員。此時，陳光榮恰巧被越共於月初逮捕囚禁，也因此得以逃過一劫，直到次年2月間方告脫逃成功。但在5月間又被法軍在西貢堤岸逮捕，面對兩面夾攻與滅教之難，陳光榮選擇和法軍妥協。雙方在6月簽訂聯盟，法越當局允許范公稷等返國，容許自由傳教，歸還各地所有查封的高台教堂，停止對高台教徒的不公平待遇。至於高台教武力則停止攻擊法軍，除保留一部分自衛部隊之外，其餘編入法軍後備武力。

對於越共而言，高台教此舉無異於叛國，因此展開慘烈的屠殺報復，大批鄉村高台教徒因而被殺。高台教徒也在德護法范公稷的號召下，加入反共行列，捍衛家園。法越當局也將西寧、美荻（My Tho）兩省管轄權，包括稅收、駐軍，交由高台教負責。

1954年6月19日，越南皇帝保大（Bao Dai）任命吳廷琰（Ngo Dinh Niem）爲總理，1955年初吳廷琰先說動高台教派（范公稷、阮成芳）以及和好教派（Hoa Hao），共同對付平川（Binh Xuyen）教派。至4月間，平川派黎文遠又與和好派鄭明世、黎光榮共同組成「民族解放聯合陣線」，企圖推翻吳廷琰。但政府軍在唐文德領導下，迅速攻進平川教派陣營，瓦解平川的武力，首領黎文遠。10月，吳廷琰當選總統，高台軍隊將領阮青鳳（Nguyen Thanh Phuong）不顧范公稷的反對，與吳廷琰談判解散軍隊。<sup>20</sup>自此至1963年11月，吳政權被軍事政變

<sup>19</sup> Tran My-Van. "Japan and Vietnam's Cao Dai: A Wartime Relationship (1939-1945)"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27 no.1 (Mar. 1996). pp.179-193.

<sup>20</sup> Victor L. Oliver. *op.cit.*, p.136.

所推翻前，西寧派的高台教徒基本上和南越政府合作。但它的武力也已自盛極一時的 25,000 人，縮減為僅只 1,000 人的聖堂警衛。

自 1975 年越共統一全越後，大批高台神職及信徒流亡海外，西寧教廷的情況也難為外界所了解。不過由於高台教長期和共產黨對抗的歷史看來，信徒必然有段艱困的時期。

## 六、結論

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論《宗教的誕生》(Religion in the making)時指出宗教具有四個元素，即儀式(ritual)、情感(emotion)、信仰(belief)、理性化(rationalization)。<sup>21</sup> 而我們在對新興宗教的觀察可以得到相同結論，在原有的宗教基礎上，由於社會環境的變動，群體宗教世界觀的增長，前述四項元素再度被強化，往往藉由改變儀式，以達到增強情感聯繫的方式，從而符合社會性的需求，產生新的宗教性詮釋，以證明其正當性與神聖性。

儘管高台教的信徒主要分佈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e)的農村，但是這個宗教的發展並非基於單一農民階層的運動，如 Jeffrey Paige 所言。<sup>22</sup> 如果信徒之中以農民居多，也恰恰符合全國人口農民所應占有的比例。應該注意的是其領導階層，多半是受法國教育的知識階級，他們利用高台教受到迫害的壓力，更為凝聚了信徒的向心力。高台教系統發展出來的社會福利比佛教或天主教更有效的吸引了一向缺乏政府體制照顧的農民，它不僅提供未來的理想世界圖像，也解脫或減輕了現世的苦難。

當然，對於統治當局而言，如此的宗教運動也是一種群眾運動、一種社會運動，這樣大規模的動員方式又和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興起有所關聯，使得統治者必需面對這個新興宗教勢力。但是不管對於宗教的利用或打壓限制，只要此一宗教的哲理或感情，能夠滿足信徒的心靈，那麼此一宗教的生命力即可長存。

由於西寧高台教自始至終與共產黨本質不同，使高台教徒在選擇合作對象時與共產黨不同，因而走向長期對抗的道路，以致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發展受到阻礙。目前，高台教的西寧聖堂雖然依舊開啓，但在政府嚴密的監控下難有發展。海外的高台信徒則分散各地，缺乏高層神職的領導，以及乩筆神諭不再，都是發展的困境。

如果高台教對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流亡海外的高台信徒，以及「革新開放」後的越南共產黨治下的社會再不能回應其精神層面需求，那麼高台教這個宗教的混育將告式微。

---

<sup>21</sup> Alfred N. Whitehea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60.

<sup>22</sup> Jeffrey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